

文史哲学者治学谈

岳麓书社

文史哲学者治学谈

本社编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文史哲学者治学谈

本社编

责任编辑：邹学明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7,000 印张：11.625 印数：1——7,600

统一书号：2285·3 定价：0.93元

出版说明

本书选编了三十余篇记述著名文史哲学者治学道路和治学经验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他们自己的回忆，有些是他人的记述。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他们中一些人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现代科学方法，去从事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怎样不畏艰难，勇于探索，披荆斩棘，敢闯新路，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直至成为一代大师。这些对于今天的文史哲专业工作者和广大文史哲爱好者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和直接的指导作用。

编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史学大师王国维·····	周传儒(1)
陈寅恪传略·····	胡守为(25)
史料的搜集、考正与运用	
——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	陈智超(43)
史学家陈垣传略·····	陈智超(49)
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	顾颉刚(82)
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	蔡尚思(113)
范老论学四则·····	蔡美彪(118)
历史不会沉默	
——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	李树喜(125)
吕振羽和中国古代史研究·····	叶桂生、胡茂林(144)
我是怎样冲破重重难关的	
——有关治学的精神和经验·····	蔡尚思(161)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周一良(178)
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	罗尔纲(187)
谈谈我治学的体会·····	王焕镛(194)
我的学史经验和体会·····	何兹全(198)
治学琐言·····	缪 钺(205)

我的治学经历·····	谢国桢 (212)
和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	杨志玖 (217)
和初学者谈“天”·····	庞朴 (223)
一代学人赵元任·····	黄延复 (229)
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郭绍虞 (236)
语言学界的建筑师	
——记王力教授·····	吴德安 (240)
谈谈我的治学经历·····	钱仲联 (257)
我和古文字学·····	商承祚 (262)
基础与专攻	
——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	陆宗达 (270)
马叙伦传略·····	郑懿德 (275)
青灯有味忆儿时·····	严北溟 (296)
我学美学的经历和一点经验教训·····	朱光潜 (303)
美学老人的青年时代·····	郝铭鉴 (310)
美学家王朝闻·····	王行之 (317)
美学研究的一些体会·····	蔡仪 (332)
走我自己的路·····	李泽厚 (343)
关于史料的鉴别·····	荣孟源 (349)

史学大师王国维

周 传 儒

海宁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号观堂，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有重要贡献和一定影响之人物。

一、时代背景

生于十九世纪后期的老一代人，所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毒害，比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前期的人，更为严重；所以反映在他们思想上生活上的矛盾，更为尖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沈曾植、林纾、严复、黄遵宪，皆是如此。简言之：思想动荡，生活沉闷，新旧思想冲突，政治、学术分裂。王国维不过其一例耳。王在政治上是落后人物，在学术上是前进人物。

王海宁生于一八七六年，卒于一九二七年，终年五十一岁。幼居海宁城内双仁巷。这个时代，正当清朝末叶，民国初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难体会，他所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毒害，是异常深刻的。概括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1. 一八七六——一八九四，即初生至十八岁，完全受封建

思想的传统教育。

2.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即十九岁至三十五岁，开始接受新学，治哲学及文学。

3.一九一二——一九二一，即三十六岁至四十五岁，转向经学、小学、版本学、甲骨学、历史学、地理学、归结于史学。

4.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即四十六岁至五十一岁，学问成熟，公开讲学，至死。

前两期属于清朝末季，在政治上他受封建主义的毒害，在学术上继承了封建文化的遗产，成为有清三百年学术思想的一位结束人，几乎所有清儒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都到他手里成功结茧，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后两期属于民国时代。在这十五年之中，他把从乾嘉老辈、道咸老辈、光宣同辈所学得来的知识，笔之于书，以传后世。另一方面，又先后在广仓明智大学、北京大学研究所、清华研究院设帐授徒，培育了下一代学术继承人，而且在若干领域，能于乾嘉学派之外，别开蹊径。他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不能埋没的。

自一九〇六年，三十岁以后，海宁孤军奋斗，辗转沪、苏、京诸地，又续娶潘氏，同居京师作小京官。宦游多暇，颇从事词曲、版本、金石之学。时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初出人间，京师亦有流传，遂得观其鳞爪，同时与当时名宿罗振玉、董康、柯绍忞、缪荃荪、刘世衍、吴昌硕、傅增湘相往还，其学日进。海宁虽不过小京官，但受罗振玉之影响甚巨，又为

旧封建思想所束缚，不能自拔。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室覆亡。罗振玉以遗老自居，不接受民国正统，携眷东渡，成为寓公。海宁亦携眷偕行，从此成为罗振玉之俘虏，间接成为封建思想之俘虏。在生活上既依存于罗氏，在学术思想上亦为之推波助澜。在东京四年（一九一一年十月——一九一六年一月），尽弃前所治诸学，而专习经学、小学、金石、甲骨及历史，与日本支那学大师铃木、狩野、箭内、内藤、白鸟、桑原相过从，商榷得失，并与法人沙畹通信讨论。中国学者，与世界汉学者共同致力于古文物之探讨，使学问有所进益自属善事；然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学者为文化侵略之掩护，而中国学者不自知，亦属可悲。

一九一六年正月，海宁归自日本，暂就英商哈同所办学术杂志编辑之职，以作生计。同时继续在日本时未竟之业，于小学、经学、金石、甲骨诸部门，作出空前卓越贡献。至一九二一年，四十五岁，而海宁之学已大成。其小学、经学，能集清代三百年学术之大成，达到所谓汉学的尖端。不仅前人不能与之颉颃，即同时代之人，亦很少能与之抗衡。其金石、甲骨、汉简、唐卷之学，则戛戛独造，为前修所不及闻、不及见，虽段玉裁、王念孙、程易畴、吴大澂复生，亦不能不让此人出一头地。

海宁著作既富，所谓有麝自然香，高名不可掩，逐渐为汉学家所倾倒，又进一步为史学家所倾倒，再进一步，即自谓有科学精神的胡适、梁启超，亦不能不推荐揄扬，遂一跃而为在中国史学界之权威。一九二一年（四十七岁），北京大学研究所聘

为通信导师。一九二四年（四十九岁），北京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执史坛牛耳，为当时治上古史第一人。北自北京，南至番禺，东起扶桑，西迄巴黎，学界无不知有王国维静安其人者。不幸当此学问成熟、名望正高之际，竟自投昆明湖而死，铸成中国史学界之巨大损失。

近代学术之趋势，清季以经学为主，民国以史学为主。乾嘉诸老，建经学基础于小学之上。所有训诂、考据、名物、金石、音韵，皆所以明经，小学昌明，经学遂亦光大，为汉宋学者所不逮。民国以来，采用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所有《诗》、《书》、《易》、《礼》、传、诸子，皆所以明史。又建史学于小学、经学之上。小学、经学发达，史学亦更壮大，为清代学者所不及。其见之于海宁思想学术，此中消息，有非局外人所能知者。

二、师友渊源

作为真正读书治学的引导人，与王海宁一生影响最深、关系最密的第一个，要算上虞罗振玉。罗、王相识，始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之年，地点则在上海农学社。第二个是沈曾植，为时较晚，亦在上海。

1. 罗振玉。

海宁为了生活，也为了积蓄游学费，在二十一岁那年，先后在陈汝楨、沈冠英两家教了一年的私塾，作为游学的准备。

时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在上海办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专门以翻译介绍西方新知识，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知识。李提摩太还竭力赞助了康梁的变法维

新运动。梁曾为李的书记。张元济、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维新。罗振玉则在上海办农学社，翻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所谓新学运动，有蓬蓬勃勃之势，这正是王海宁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

一八九八年，农学社缺一个书记，原定请上虞许默斋，许推举王海宁自代。海宁乃襁被入沪，充农学社司书，同时投入农学社所附设之东方学社学日文。主持人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是为海宁结识日本学者之始。海宁在沪，以半日作工、半日学习，备极辛苦。海宁与上虞接壤，于份为同乡，而罗、许、王皆相识。罗乃约王为东方学社庶务，免费学习。庶务事颇清简，同学不过五、六人，遂得专力治学。东方学社，先开日文、英文课，作为翻译东西农业书籍之准备。既而觉察农业科学，与数理化有关，遂又开数理化课。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庚子，在东方学社学习二年有余，因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北京，学社停办。海宁《三十自序》记其事说：“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方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海宁此时，只摸索了开新学之库的钥匙，尚未走进新学之大门。

次年罗振玉主持武昌农学校，招海宁往任译授。仅半年而罗去职，乃出资帮助海宁赴日本留学，习英文及数学物理，仅一年而归。又明年（一九〇二年），罗振玉为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招海宁赞襄校务，兼为编译农学报及世界杂志。为应付杂志之需要，兼萦扰于人生究竟问题，开始治哲学。一九〇三年，罗振玉荐海宁担任通州师范学校心理学、伦理学教员。

一九〇四年，罗任苏州师范学校监督，海宁自通转苏，仍任心理学、伦理学课。一九〇六年，罗奉学部调，携家北上，海宁亦随行，至此，已三十岁矣。自一八九八年，罗、王结识于上海，至一九〇六年，同至北京，八年之中，两人形影不离。作为领导人之罗振玉，在学术上举棋不定，时而治农学，时而提倡外国语文，时而奖励数理化，时而办师范教育，需要伦理心理人才。作为追随者之王海宁，亦复举棋不定，在日文、英文、数理化、哲学、心理、伦理、社会诸学科上团团转。虽海宁自视甚高，然以今日之社会科学准则绳之，实则卑之无甚高论。海宁在学术上有天才，然不在于上属诸科学上。罗、王二人，皆尚未发现自己长处，亦未踏上终生安身立命之路。概括一句话，王追随罗，在学问上似乎走了八年弯路，并无巨大成绩。

学问之道，是离奇而曲折的。王海宁自七岁至十八岁，受学于三家村老学究，读经，自己认为无用，而且极不愿学，究其所得甚大，奠定他终身在学问上之基础。自十九至三十，追求新学，从罗振玉、藤田丰八治语文、科学、哲学，用力甚勤，自视亦高，实际收获不多，与后来在学问上之成就，并无关系。自三十至三十六，与北京名宿往还，开始转入正途，由文学而治文学史，搞戏曲。又由版本学、古器物学而治小学、经史，搞金石甲骨，始发现自己天才之所在。用通俗的话来说，找到治学问的途径和方法，走进了学术的乐园。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即三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十年之中，生活单简，精神专一，精力弥漫，在学问上一帆风顺，攻克一个堡垒又克一个堡垒，其兵锋之锐利，几乎前无古人，学问于是大成，海宁

具有分析、考订、综合、类比之天才，而新出土之材料，又有以助之。在书籍上、资料上、生活上，颇得力于罗之赞助。罗、王合力，创一新学派，集清代三百年学术之大成，树二十世纪学术之先声。

2.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

海宁晚年，即四十六岁至五十一岁，颇致力于四裔碑铭及西北地理之学，作为他的引导人是嘉兴沈子培，胶州柯凤荪。沈子培的影响，尤为巨大。

海宁之识沈子培，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时方从日本送眷属回海宁，道出沪上，特往谒之。最初，所商榷者为古音韵问题，进而谈古字母问题，其后又从沈处，借所藏江有诰《音学五书》读之，借宋本《水经注》校之。直至一九一九年，始涉及西北史地之学，此固为沈所独擅者。时海宁初读九姓回鹘可汗碑，先见伯希和本，及李文田和林金石录本，尚有拉特禄夫著蒙古图志本不及见，特就沈处借阅此书。继又从沈处钞录沈所著和林三唐碑跋，盖其治学兴趣已遂转向西北地理、四裔碑铭之学矣。同年，浙江省修通志，聘沈子培为总纂，王海宁为分纂，彼此商榷义例范围，常有讨论。在这几年之中，颇致力敦煌写经，作《西胡考》，《西域井渠考》，校订《穆天子传》，采用沈说颇多。沈每见一书一画，一金石拓本，必招海宁前往商榷。海宁每成一文，必先以质沈，其交谊在半师半友之间，除罗叔言外，海内学人，为海宁所最服膺者，子培而已。自沈之歿（一九二一年），海宁认为，一代绝学沦亡，有挺身而出，担负起来之必要。晚年治元史及西北地理，在精神上，受到沈子培之深切感召，

不可否认。

在国际友人中，海宁与日本之支那学学者皆友善，著书投文于日本艺文杂志、东亚研究杂志。在西方学者，独与伯希和友善，常有信简往来，商榷得失。在北京大学研究所任通信导师时，颇与胡适之、沈兼士、马叔平、朱希祖有学术上之商榷往还。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时，则与吴宓、梁启超、陈寅恪、李济之、赵元任诸大师有所往还。至其在哈同大学（广仓明智学院）任教之学生，北大研究所之学生，以及清华研究院之学生，多已成名，桃李遍于天下。其乡人赵斐云，随海宁二年，得其版本目录之学，供职北海图书馆善本室，亦铮铮有声。然则所谓沈、王学派者，以钟鼎甲骨之学为主，以史学、小学、经学为辅，更以元史、西北地理、四裔碑铭为翼，自民国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已大张其军，独未标名立号而已。

三、近代中国学术资料的新发现

海宁自己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海宁这个话，不是空谈，而是有为而发。他列举了历史上三大发现与由此引出的新学问来，证明近代的新发现，以及由此所将引出的新学问，以提示近代学术上的新趋势。而他是敏感、最能洞见新事物的重要性之人。他治学问的方向，正是

根据这些新材料，掌握这些新趋势。他认为中国清末民初新发现的学问，可以分为五类：1. 殷墟甲骨文字；2.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出土简牍（流沙坠简）；3. 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4. 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5. 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四裔碑铭）。归纳起来说：“今日（清末民初）的时代，可谓之新发现时代，自古以来，未有能比者也。”既有新材料，随之而起，必然有几种新学问。

结合着海宁自己来谈，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经卷，皆曾以全力研究之，且于其中得到许多启发，解决许多问题，不愧为此三种学问大师。惟内阁档案、四裔碑文，尚未作深入之研究，虽偶有所征引，仅涉樊篱。并且除这五种新发现之外，其他方面，后来亦陆续有所增加，如西夏文字，辽道宗陵墓的契丹文书，清宫的夷务始末记，近代外交史资料，华北及东北、西北的史前遗存，东北的满洲老档，英、法、德、波斯、西班牙、葡萄牙各国传教士及学者有关元明清三代之记载，皆为海宁所不治，而有待于后人之努力。

海宁为时代和出身阶级所局限，不得与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真理，故对于中国历史上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资料不曾注意。又昧于民族革命、阶级斗争之大义，故对于奴隶主如何剥削奴隶，地主如何剥削农民，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反抗异族运动的史料，不曾注意，即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搜集、整理的社会经济史资料，亦不为其所善。其他宗教史、中西交通史、工艺史、外交史，皆非其精力所及，彼殆一粹然卓然学术史专家、一生为中国学术史而努力者也。

假如王海宁不死于五十一岁之壮年，再活十年、二十年以达于耆老之年，是否能有一整部头之著作问世，以供后学者之楷模？撰者认是亦不可能。海宁治学趋势，追求地下新发现，追求实物与文献之结合，如四裔碑铭、西北地理、内阁档案、东方文字，何其浩瀚而无涯埃！竭一人之精力不能穷，竭一代人之精力亦不能穷。此海宁所谓“然此等发现物，合世界之全力，以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蒙庄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四、甲骨学与古代史

海宁在中国学术界的最大贡献，在于搞通甲骨文字。梁新会说他：“奇字译鞮、创通龟契。”尤在于把甲骨学与古代史相结合，在古代史上，起建设性作用。海宁亦自谓甲骨学是近代新学问的第一种。

甲骨出现于殷墟，在河南安阳县西北四五里，地名小屯，北滨洹水，南接邺县。自宋以来，即时有铜器、龟甲兽骨出土。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以后，出土更多。先后入王懿荣、刘铁云、明义士、王襄之手。自一九〇六年以后，上虞罗振玉开始大量搜购，达三万片以上。罗、王寓居日本京都四、五年，专以研究甲骨为事，先后成书。

当年国内甲骨收藏家，无虑数十，东西各国学者，窃占者亦甚多。然收藏之富，无过于上虞。治甲骨学者，亦数十家，然考订之勤，辨析之精，无过于海宁。至清末民初，所谓新学

间的甲骨学，罗、王为泰山北斗，其余皆罗、王及门弟子或私淑弟子，惟异军突起之郭鼎堂不在内。

海宁最能把甲骨学与上古史相结合，治甲骨志在明史。而其治殷史，皆根据于契文。计先后所撰有关殷史的论文如下：《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都八迁考》。

关于《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之写成，其经过极为艰苦曲折而复杂。作为历史问题来考虑，应当着重指出这两篇文章：第一证明《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之正确可靠，《书经》之《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之可靠。其次证明《世本》、《竹书纪年》，亦属基本可靠。海宁又由此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为古代史开辟了资源。其三，根据地下材料，以订正纸上材料之讹缺；又用纸上材料，补足地下材料之脱略。如此而殷代历史，得两重之证明，所关古代史，甚为宏大。其四，民初在古代史方面，发生了一股疑古风，对尧、舜、禹、汤，甚至文、武、周公、孔子，无不加以怀疑，使国人如坠五里雾中，自海宁出，此风一变。古代史基本可靠。有地下材料为之证明，学者勿失信心。

用甲骨以证历史，风气既开，后起学者，有人从事于礼制的研究，有人从事于社会经济的研究。有人从事人名、地名的研究，由是知伊尹、巫咸、周、杞、虎、孟、微、井、土、羊、鬼方，皆确有其人，有其国，可以与经史相印证。中国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年，而且最早为奴隶社会，逐渐迈入封建社会，由狩猎、畜牧转入农业，又转入工商业，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吻